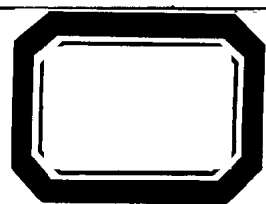


徐苏斌 著

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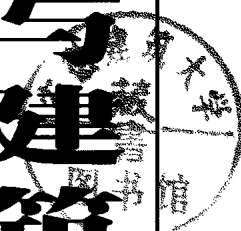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SUNTORY文化财团

赞助出版

徐苏斌 著

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本世纪初以来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由于历史的原因，书中很多资料没有在中国公开过，因此颇显珍贵。

全书共有9章。首先追溯了百年前欧洲国家对东方文化的研究，追溯了日本是如何深受刺激，重新反思东方文化的，并开始掀起东方学研究热的历史背景；继而全面系统地叙述了日本的建筑研究者伊东忠太等以法隆寺为起点，到中国寻找日本建筑的根源，从而开始了对中国城市与建筑进行研究的史实。在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研究的百年中，既有日本研究者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也有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和喜爱，既有日本侵华战争的血雨腥风，也有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再研究。最后，总结了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进行考察的目的、方法、内容和成果。该书多角度、多层次、全面地剖析和展示了百年来邻国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关注和研究，显示了中国城市与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

该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附有许多国内从未公开过的历史档案，可供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和城市建筑研究人员查阅和收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 徐苏斌著.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9.2

ISBN 7-80124-933-X

I. 日… II. 徐… III. ①城市-研究-中国 ②建筑风格-研究-中国 IV. TU-8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38079号

书 名	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作 者	徐苏斌 著
出版、发行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市三里河路6号 100044)
	网址: www.waterpub.com.cn
	E-mail: sale@waterpub.com.cn
	电话: (010)63202266(总机)、68331835(发行部)
经 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密云红光照排厂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规 格	787×1092毫米 16开本 18.5印张 334千字
版 次	1999年2月第一版 1999年2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 数	0001—2000册
定 价	50.00元

凡购买我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前言

90年代是信息的时代。在许许多多有关建筑的信息中，最先流入中国的是有关日本现代建筑的信息，一些杂志和图书介绍了大量的日本现代建筑和建筑师。但是人们在对建筑的表层信息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便希望更进一步了解其历史背景和相关方面的研究，比较中日两国近代和现代发展的异同点，以求更全面地了解日本，促进中国建筑现代化的进程。著者正是基于这一想法开始研究中日建筑交流史的。关于《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的最初执笔，是在撰写博士论文《比较·交往·启示——中日近现代建筑史研究》（天津大学，1991年11月）的时候，但此书内容只包括论文的很少一部分。以后在日本从事研究的若干年中，著者虽对日本现代建筑有了较深刻的理解，但有关日本对中国的研究还知之甚少。

众所周知，古代日本受中国的影响很大，但是在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许人们会认为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不会很多。其实不然。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日本反思了全盘西化，重新认识东方文化，随之对中国的美术、佛教、建筑与城市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日本，有东洋文库，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还有其他很多有关亚洲问题的研究机构，在这些机构中有很多中国学研究者，他们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的研究资料，其研究成果多发表于日本，很少被介绍到中国。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关于日本在建筑研究方面做了些什么，积累了些了什么，人们并不十分清楚。虽然中国可能熟悉丹下健三、矶崎新、安藤忠雄等日本现代建筑师，但不一定了解伊东忠太、关野贞等早期的中国建筑研究者。而日本的东方学研究者所作的研究与中国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应当为中国所关注。过去，由于历史原因，过去中国缺乏这方面的研究，但并不意味着这项工作不重要。著者深感这一信息的反馈不可能依赖于日本的现成资料，因而开始着手搜集资料，写作本书——《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本书参考了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量的公开或尚未公开发表的资料。限于当时的印刷条件，有些图稿欠清楚，为保证本书的出版质量，著者删除了某些地图和图表。尽管如此，依然还



有一些图不很清楚，敬请读者谅解。

10年前，著者带着各种问题开始了对中日建筑交流史的研究。回顾这段研究历程，著者每走一步都曾得到中日各方专家的指教、鼓励和帮助。在这期间，承蒙天津大学的彭一刚先生、聂兰生先生、邹德侓先生、王其亨先生，清华大学的汪坦先生、吴焕加先生、张复合先生，东京大学的藤森照信先生、村松伸先生，庆应大学的青木信夫先生等悉心指教。在日本和中国的数年相关课题的研究期间，承蒙日本学术振兴会、鹿岛科学振兴财团、中国博士后研究基金会、住友财团的资助。在出版方面，承蒙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SUNTORY文化财团的赞助，承蒙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及该社阳森女士的热情支持和多方协助。此外，还有一些老师、朋友及相关研究者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帮助，终使著者的研究得以顺利完成。在此，著者一并谨向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对著者来说，现本应是回报父母的年龄，但却常常感到力不从心，未能尽孝，深感内疚。父母为我的研究工作所作出的种种牺牲，我诚表深深的歉意。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在中国历史和地理知识方面给予了我许多启引和指教，母亲在做人和治学方面给予了我许多教诲和启迪，受益实为匪浅。今天，我的这部著作面世，愿能给我的双亲带来安慰和欣喜。

徐芬斌

1998年9月于东京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绪论
3	一、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进行研究的原因
7	二、研究的动态与研究的内容
9	三、有关历史问题的几点思考
11	第二章 欧美国家对中国的研究
13	一、欧美国家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20	二、欧洲国家对中国建筑的研究
27	三、小结
29	第三章 日本东方学研究的勃兴
31	一、“亚洲”和“东洋”等词的概念
32	二、东方历史教育的启蒙
32	三、东方美术史的研究
35	四、东亚考古学的研究
35	五、东方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
37	六、东方史学的研究
37	七、小结
39	第四章 日本 20 世纪初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考察
41	一、日本学者对中国大陆的考察
43	二、伊东忠太对中国建筑的考察
57	三、关野贞对朝鲜和中国建筑的考察
68	四、冢本靖对中国建筑装饰的考察
69	五、常盘大定对中国佛教史迹的考察
73	六、小结
75	第五章 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77	一、东亚考古学会组织的研究
98	二、东方文化学院组织的研究
137	三、小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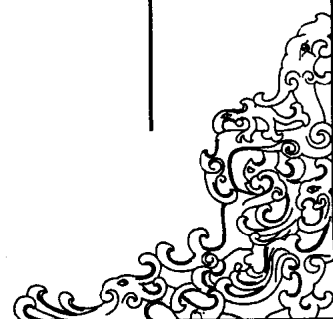




139	第六章 日本对被其占领的城市与建筑的研究
141	一、对中国东北的考古和建筑的研究
170	二、对中国台湾建筑的研究
173	三、小结
175	第七章 日本战后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成果
178	一、村田治郎的研究成果
185	二、竹岛卓一的研究成果
190	三、饭田须贺斯的研究成果
194	四、驹井和爱的研究成果
198	五、水野清一和长广敏雄的研究成果
203	六、其他的研究成果
203	七、小结
205	第八章 日本 80 年代后对中国城市、近代建筑和民居的研究
207	一、东京大学的研究情况
211	二、京都大学的研究情况
213	三、法政大学的研究情况
215	四、东京工业大学的研究情况
218	五、其他的研究情况
220	六、小结
223	第九章 结语
225	一、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研究的特征
234	二、日本对中国研究兴盛的原因
236	三、日本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意义
239	四、日本今后对中国研究的发展趋势
240	附录 日本研究者的履历及著作一览表（日文）
284	参考文献

第一章

绪
论



本书是关于 1901 年以来近百年间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历史和成果的研究。

中日之间有着长期的文化交流，但也有段不愉快的历史。关于中日关系史已经有许多研究，如对军事、经济、外交等都有专门论述，但是对日本关于中国城市与建筑方面研究的情况则很少介绍。

近百年来，日本不断研究中国的美术、佛教、建筑和城市，积累了大量的资料。本世纪上半叶的资料大多沉睡于图书馆的书库，落满了灰尘，成为历史；而战后的研究成果又多发表于日本，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研究尚在进行中，很多还没有正式发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建筑研究者大多将注意力集中在日本的现代建筑上，但是如果亲身到日本体会一下，就会感到日本在对中国的现代建筑研究方面同样投入了很大力量，特别是在中国的城市与建筑研究方面有着惊人的积累。

一、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进行研究的原因

1. 中日建筑史研究方面的互补性

中日建筑同源，始于近代的日本研究者就是本着这个指导思想到中国寻找日本建筑之“根”的。针对中国的城市与建筑这一研究课题，中日两国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互补性，即研究内容的互补和研究方法的互补。

(1) 研究内容的互补性

日本建筑保护得较为完好，究其原因，梁思成先生分析到：“至于木建筑遗例，最古者当推日本奈良法隆寺诸堂塔，盖建于我国隋代，距今已千三百余载。然日本气候湿润，并非特宜于木建筑之保存，其所以保存至今者，实因日本内战较少，即使有之，其破坏亦不甚烈，且历来当道，对于古物尤知爱护，故保存亦较多。至于我国历朝更迭，变乱频仍，项羽入关而‘咸阳宫室火三月不灭’，两千年来革命元勋，莫不效法项王，以呈威风，破坏殊甚。在此种情况下，古建筑之得以幸免者，能有几何？”[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中国营造学社汇刊》，3(2)，1932 年 6 月]。

对日本来说，法隆寺（607 年，一度全部烧毁，于 710 年重建一说较为可信）是最早引入日本的建筑，是日本的国宝，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法隆寺使用了人字形补间铺作，这种形式如果仅从日本建筑寻根是没有结果的，为此，研究中国建筑有着特殊的意义。由于梁思成所述各原因，中国现存的木构建筑已经很少了，1931 年发现了独乐寺（984 年），成为当时在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木构建筑。当时，中日研究者都在寻找更古老的木构建筑。1937 年梁思成发现了唐代佛光寺大殿（857 年），1953 年普查中又在五台县发现了唐代南禅寺大殿（782 年），但至今也没有发现比日本法隆寺更早的木构建筑，因此，



法隆寺便成为研究中国木构建筑最早的参考实例。

另外，日本京都的凤凰堂是“寝殿造”的典型代表，在日本除了仅剩遗址的毛越寺之外，凤凰堂是现存唯一的实例。通过研究发现，寝殿造园林与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上京城禁苑有关，而渤海国完全是仿唐制，因此，“寝殿造”与中国唐代有直接关系（村田治郎：《中国的帝都》，综艺社，1981年4月），但由于渤海国也仅剩遗址，所以，凤凰堂也是研究中国建筑的重要参考实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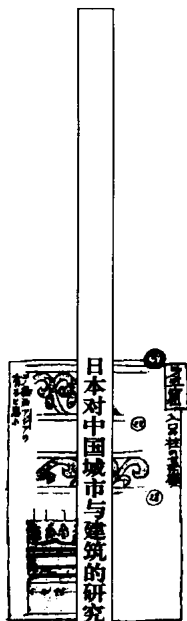
图书出版也是如此。中国最著名的建筑经典著作《营造法式》和《园冶》相继流传到了日本，前者收藏于静嘉堂文库，后者收藏于内阁文库。《营造法式》是明朝张苍镜抄本，与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1919年在江南图书馆发现的“丁本”同源。《营造法式》的研究最早是由中国开始的。但是《园冶》最早的引用则见于大村西崖的《东洋美术史》（1925年），并引起了中国的注意，于是营造学社从日本得一手抄本；1930年又得知内阁文库有明代印本，所以，文献部长阚铎写信托伊东忠太代为影印（阚铎给伊东忠太的信，伊东知惠子藏，1930年9月5日），后用中国北平图书馆的前两卷和抄本与内阁文库本校对，于1932年正式出版《园冶》（《园冶注释》，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10月）。

诸如此类的实物和细节还有很多，因此日本要到中国寻根，而且中国也可以从日本的研究成果中了解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以及弥补中国因缺乏实例而无法进行的研究，充实和完善中国对自身建筑的研究。

（2）研究方法的互补性

古代对营造学研究并不重视，更谈不上方法。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建筑史研究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这就是借鉴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过去中国有金石学，重视文献考证，日本江戸时代学习了金石学的研究方法。而从詹姆斯·法古孙开始，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了建筑历史研究，建立了新的研究方法。日本首先学习了这一方法，开始重视实证考察。日本的研究方法也给中国以启发。在中国营造学社组建初期，比较重视传统的文献考证，而忽视实物考察，学社只设文献部和法式部。但是1931年关野贞考察独乐寺，推断其为辽代建筑，其判断的准确性令人吃惊，学社从中深感实地考察的重要性，也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发现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建筑，如佛光寺。另外，除了文献研究和实证考察之外，伊东忠太还采取了独特的文字研究法，从古老的图形文字考察建筑的沿革，不过该方法有一定的局限性。

日本对近代建筑的研究也采用了实证的方法，特别是对现存近代建筑进行普查，这可以说是过去研究古代建筑研究方法的延续。80年代中日两国对中国的近代建筑进行了合作考察，



将实证方法运用于中国，以后又用于越南近代建筑考察，加快了考察的速度。

2.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的代表性

近代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虽然不如欧美早，但在数量上远在欧美之上（表 9-3）。从梁思成先生的视角来看他的研究时代，欧美有关中国城市和建筑的研究也为数很少，他曾说过：“在宾大毕业后我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阅读了当时所有能查到、找到的有关中国建筑的资料。我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依靠这些书本不能完成我的论文。我必须回国去实地调查。”（林洙：《大匠的困惑——建筑师梁思成》，都市改革出版社，1991 年 5 月）。

表 9-3 中虽然统计的是 1945 年前的数字，但是战后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没有对中国建筑进行实质性的研究，80 年代后又是以日本为首开始对中国重新进行研究。日本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研究成果，其重要原因如下：

1) 中国古代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到城市与建筑，中国对日本及朝鲜的影响处处可见。为了更好地了解日本自身的文化，日本研究者从本世纪初就开始对中国的城市与建筑进行考察。这种积极性是欧美所不具备的。同时，日本文字和中国文字接近，对日本人来说，读解中国文献较欧美人更便捷。

2)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日俄战争的胜利更使日本向帝国主义阶段迈进了一大步，它步老牌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后尘，开始觊觎中国。为此，当时的日本政府从另一个角度开始鼓励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进行文化研究，并在经济上资助研究者，从而加速了对中国、朝鲜的研究。城市与建筑研究也在此范畴之内。事实上，帝国主义分子是将其研究成果作为向中国进行经济、文化渗透和侵略的理论依据。

3)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对亚洲及世界各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了各国的高度重视，日本对中国各方面的研究热再度兴起，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发展的研究也出现了战后新的高峰。

由于以上原因，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迅速。因此，搞清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情况，并不仅仅是中日建筑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内容，而且也是世界对中国建筑关注的焦点问题。

3. 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性

自古以来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频繁，留下了很多故事，在



城市与建筑方面也留下了很多交往的痕迹和不解之迷。为了寻找谜底，本世纪初日本开始了寻根的活动，于是开始了中日之间建筑方面交往的新的历史。不幸的是，近代的中日交流史夹杂了殖民活动和罪恶的战争，给中国人民心灵深处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这是不可抹杀的历史。与此同时，日本研究者的调查活动也在进行，而且不能说与整个局势没有关系。不过，如果因为发生过战争而否定存在着交流的历史，如果没有人在古代中日建筑文化交流史之后续写近代史，那么将来这段历史就会是一个空白，为后人了解 20 世纪的交流史设制了障碍。因此，完成这一研究工作已成为今天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与国际上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界的接触很少。中国有过两次与国外研究界的接触：一次是 30~40 年代中国营造学社刚刚起步时，另一次是改革开放后与国外进行合作研究。前者，朱启钤社长在建社之初就说过：“方今世界大同，物质演进，兹事体大，非依科学的眼光，作有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如能与中外专家，交换学识，尤所祈盼，所冀……”[朱启钤：《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1），1930 年 7 月]。本着这一精神，中国营造学社不拒绝与所有外国学者进行交流，也包括了“九一八”前的日本建筑界。但是由于侵华战争爆发，破坏了中日研究者之间的感情，交往中断。新中国成立后中日各属自己的阵营，交往也很少。在这期间，日本很详细地收集了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成果[《东洋建筑史文献目录 1936—1966》，《中国石窟关系文献目录》，《建筑杂志》，84（1005），1969 年 1 月]，而中国对日本等国外的研究信息收集的却很少，改革开放后的合作研究也仅限于个别领域、个别学校。所以，中国尚没有从整体上全面了解日本对中国的研究情况，打开世界之窗，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外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建筑的，这是本书所要达到的目的。

4. 梁思成精神的倡导

梁思成先生（1901—1972 年）是中国最优秀的建筑史学家之一，回顾他走过的道路，我们不仅为他的研究所折服，而且也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早在 20 年代梁思成先生留学美国时，就曾经查阅了所有的欧美国家关于中国建筑的书籍资料，也了解了日本的研究情况。他曾说：在宾大学习的时候，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当时西方学者尚未注意中国建筑的发展和技术，但我感到日本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中国，如著名学者大村西崖（1868—1927 年，日本美术史家，1897—1927 年任东京美术学校教授，教授东洋美术史，著有《支那美术史雕塑篇》、《东洋美术史》等——笔



者注)、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么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林洙:《大匠的困惑——建筑师梁思成》,都市改革派出版社,1991年5月)。

如果通览日本的中国研究文献就会发现,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开始研究中国建筑之前,日本研究者伊东忠太和关野贞都曾提到过东方建筑史的研究只能由日本人来完成(伊东忠太:《支那建筑史》,1925年;关野贞:《支那古代文化的遗迹》,1918年)。而在梁思成、刘敦桢等开始研究之后,已看不到类似轻蔑的词汇了,甚至在研究中国建筑中也引用中国的研究成果。中国营造学社在短短的时期内取得了令日本人刮目相看的成果,为中国争了光。

日本的研究像一面反光镜,让我们再认识中国建筑,常言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从日本研究者对中国建筑的痴迷中,我们能切身感受到中国建筑文化的博大精深,面对这一文化遗产,唤起了我们与梁思成先生同样的民族情感,中国建筑研究者对中国建筑历史研究有着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

二、研究的动态与研究的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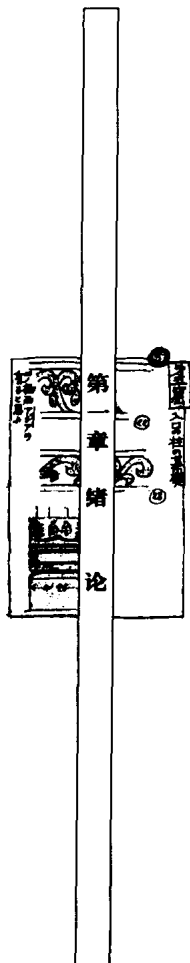
1. 国内外的研究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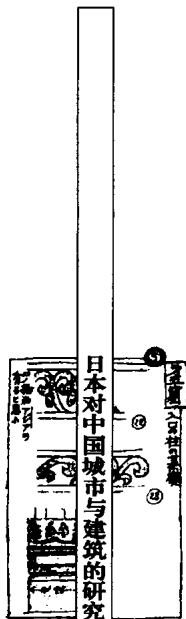
本书的研究内容一方面是日本亚洲建筑史学史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建筑史学史的一部分,是个较新的课题。在日本,因为80年代之前关心中国研究史研究的人很少,80年代以后注意的焦点首先是中国建筑本身,直到90年代才开始注意到应该总结历史了,加之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留学生的参与,本研究开始逐渐起步了。1937年前,中国营造学社曾和日本交换书籍,据笔者统计(《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1937年),有817册日文图书及杂志交换或赠送,因此,那时候还比较了解各国的情况,但以后便长期割绝了往来。80年代以后,最早涌进国门的是新建筑、超高层、新技术、新材料,很少叙及历史学研究,但是随着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化,中日建筑历史合作研究的增多,越来越发现有很多在中国从来没有发表过的研究成果,这属于中国建筑史的一部分,因此有关研究也就开始了。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村田治郎:《东洋建筑史研究的课题》[《建筑杂志》,84(1005),1969年1月];

西川幸治:《东洋建筑史研究的展开》(《日本近代建筑发达史》,第十编,第八章,丸善书房,1972年);

村松伸:《伊东忠太见闻野帖——清国》(柏书房株式会社,1990年12月),《忠太的大冒险》(《东方》,153—165,1994年





1—12月)；

泉田英雄：《J.Fergusson 登场以前的东洋建筑史学史研究》（《日本建筑学会大会讲演梗概集》，1993年）；

徐苏斌：《近代日本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概况》（《日本建筑学会大会讲演梗概集》，1993年），《关野贞的中国建筑考察——以关野贞的中国考察笔记为题材》（《日本建筑学会大会讲演梗概集》，1994年），《近代日本关于中国城市、建筑史研究》（鹿岛财团研究助成报告，1995年7月），《近年来日本关于中国建筑的研究》[《世界建筑》，(6)，1997年12月]；

青井哲人、韩三健等：《关于东洋建筑史最初的言及》（《日本建筑学会大会讲演梗概集》，1993年）；

读卖新闻社编：《建筑巨人伊东忠太》（读卖新闻社，1993年）；

《亚洲的梦幻》[《建筑思潮》，(19)，1995年3月]；

田中禎彦、青井哲人：《满洲建筑史研究概况和历史特征》（《日本建筑学会近畿支部研究报告集》，37，计划系，1997年7月）；

田中禎彦、青井哲人：《满洲、热河古迹的概况和其特征的评价》（《日本建筑学会学术讲演梗概集》，1997年9月）。

这些文章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一部分或一个时期的建筑情况进行了研究，尚未进行较全面的介绍。本书试图更为全面地介绍日本的研究情况，使读者对当时的情况有较全面的了解。

2. 近百年间的四个研究阶段

建筑与考古研究有相似之处，即研究的阶段非常类似。第一阶段主要侧重日本，第二阶段为朝鲜，第三阶段为中国，第四阶段为西域和东南亚国家。本文主要侧重于中国，但也涉及与中国相关的国家。

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研究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初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考察（1901年—20年代后期）；

第二阶段：创建研究机构和殖民地建筑研究的兴起（20年代后期—1945年）；

第三阶段：中国研究的低潮期（1946年—80年代初期）；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中国研究热（80年代初期—现在）。

3. 阶段划分的依据和特征

第一阶段：1901年以伊东忠太首次中国考察为标志，经过了中国建筑全域性的普查之后，完成了中国建筑通史《中国建筑史》，1925年首次发表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调查以

个人独立考察为主，所做的工作为建筑普查，尚未进行个体建筑的精确考察（第三、四章）。

第二阶段：以 1926 年创建东亚考古学会，继而 1929 年创建东方文化学院为标志。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有组织地进行中国建筑的研究，研究得到了异常的发展，这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需要有直接关系；特别要说明的是，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了，且研究阵容形成了梯队（第五、六章）。

第三阶段：战后日本无法对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主要是完善以前的研究工作，出版图书，中国研究走向低潮。其特点是，以整理自己考察的资料及查阅文献为主，研究数量较少，研究者主要是第二代（第七章）。

第四阶段：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日本掀起了中国研究热，战前没有进行过的研究如民居研究、园林研究、近代建筑研究等，均在这一时期兴起。其特点是以大学研究机构中的学生为中心，多为集团性研究，并且合作研究较多（第八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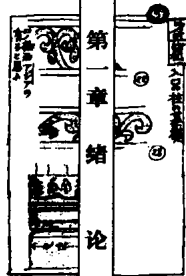
三、有关历史问题的几点思考

1. 对中国建筑史范围界定的问题

中国建筑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时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和越南等。过去由于条件的限制，研究往往集中在中国国内进行；但是近百年来，国外特别是日本对中国城市与建筑进行了诸多的研究，探讨了日本建筑的起源。这一研究既属于文化交流史的范畴，也属于中国建筑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应局限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领域，人为地缩小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范围。这里可通过日本的研究了解中国建筑对邻国的影响。

2. 历史评价的问题

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各时期都有不同的背景和目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近代的研究，日本近代对中国的城市、建筑、考古研究很多，出现了一大批中国学研究者。一方面，无论这些研究者的原始目的如何，无疑在客观上起到了日本对中国渗透和侵略的急先锋作用。他们对中国问题挖掘得越深、探讨得越清楚，为殖民者提供的理论依据就越充分。因此，对他们的评价不能脱离时代的背景，这一点是应该特别强调的。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者的研究内容本身属于中国建筑史的范畴，而且与日本现在的中国建筑研究不无关系，因此，应该认真地面对战争这一畸形时代的产物，客观地加以评判，而不应该主观地跳过这一段历史。



3. 词汇表述的问题

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涉及很多带有殖民地色彩的词汇，如“支那”、“满洲”、“满洲国”、“东洋”等，这是近代不能抹去的历史，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独特的难写之处。本书在描述过程中均使用现代用语，如“支那”改为“中国”、“满洲”改为“东北”、“东洋”改为“东方”（近代研究改为“东方”，现代研究直接用“亚洲”），但是这种现代用语并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原貌。为尽可能地真实，对固有名词（书名）、引用语保持了原貌。特别要说明的是，有些地名不能完全与现在的地名对应，如“满洲”的概念中包含了热河（今承德），而今天所称的“东北”则不包括承德，所以虽然改用现代用语，但在阅读时应该格外注意。另外，对将“满洲国”改为“伪满洲国”，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曾经拜访过权威人士，他认为：历史就是历史，中国历史上没有“伪满洲国”，只有“满洲国”，所以应该延用原称谓。应该说“满洲国”也是固有名词，但是由于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暂且用“伪满洲国”，这个问题还可留待以后深入探讨。

